

从“贼巢”到“邹鲁乡”： 明末清初粤东大埔县白垵乡村社会变迁^{*}

肖文评

(中山大学历史系, 广东广州 510275)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 广东梅州 514015)

摘要: 明末清初的粤东地方社会经历了一个由“乱”到“治”的过程。文章以大埔县白垵村为个案, 具体探讨该村在由“贼巢”到“邹鲁乡”的变迁过程中, 乡绅阶层的产生及其对地方社会变迁的影响和作用。对于认识粤东地方社会转型的细节和内在机制, 理解客家传统社会, 这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贼巢; 科举; 文化之乡; 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 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639(2006)02-0050-06

宋明以来, 粤东地方的“峒寇岛夷”问题, 一直是国家和地方政府难以解决的一大问题。但至清初“复界”以后, 地方社会趋于稳定, 经济文化出现了较大的发展。对于这种社会变迁, 陈春声、黄挺等已有相当深刻的研究。陈春声认为, “大致从明嘉靖至清康熙的一百多年间, 是潮州乡村社会逐渐被乡绅阶层控制的重要转折时期”^[1]。但对于乡绅阶层的产生及社会转型的细节和内在机制, 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而且他们的分析多以沿海的韩江三角洲为参照, 对于内陆山区则关照较少。

随着19世纪末具有近代意义的西方族群观念的输入和国内客家意识的形成, 经丘逢甲、温廷敬、罗香林等学者的建构后, 逐渐形成“客家文风由来就盛”的观念^{[2](P537)}。客家研究的开拓者罗香林在讨论客家人文时, 认为在朱明一代, “以惠汀各属, 及赣南各客家住地, 以及潮州的大埔为人文的中心”。“降及清代, 客家的文物中心, 渐由汀韶惠各州, 而移于嘉应及大埔二地。”其主要依据是“在清一代, 广东的科甲, 以嘉应本州及大埔为最盛”^{[3](P20)}。从明至清, 大埔都是一个重要的客家人文中心。对于这个人文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至今未见系统的研究成果。大埔文化, 以茶阳饶姓、白垵杨姓、双坑何姓等, 最为知名。其中白垵“夙称邹鲁乡”^{[4](上编, P289)}, 自清代以来科甲蝉联, 人才辈出, 是著名的“文化之乡”。本文以白垵为个案, 具体探

讨明末清初客家乡村社会的变迁及其社会影响。

一、“贼巢”及其转变

虽然罗香林把明代的大埔视为客家人文中心, 但当时的大埔实为弹压“峒民作梗”从饶平拆出而新设, 且不时发生“寇乱”, 朝廷多次调用大军才得以平息。

正德以来, 明政府有“南倭北虏”之虞, “边供费繁”。而明世宗又好兴“大工”之役, “加以土木、禘祀、月无虚日, 帑藏匱竭”, 导致了全国性的财政危机^{[5](卷78)}。郑振满认为明政府解决危机的措施, 不是开源, 而是节流, 不断裁减地方经费, 结果地方政府很多事务因缺乏经费而无法举办, 从而导致对地方社会的失控^[6]。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为了满足不断增加的财政需求, 又不断加重编户齐民的负担, 从而导致编户不断逋逃脱籍, 逃入山海之中, 亦农亦工亦“盗”, 不纳赋税, 不服差役, 与官府对抗。因此, 就官府和士绅而言, 这些在山中耕作而不纳赋役尤其是与官府对抗的居民, 就是“盗”、“贼”、“寇”了。明代中叶以来, 全国出现“群盗蜂起”的局面, 而尤以广东最为突出^{[7](P97)}。

位于粤东北山区的大埔, 设县前为饶平县所辖, 是一个“盗贼”横行、官府难以控制之区。专门为控制赣闽粤湘四省交界地区“盗贼”活动而设的南赣巡抚在请求朝廷

* 收稿日期: 2005-06-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04CZS006); 嘉应学院基金项目(04JK036)

作者简介: 肖文评(1967-), 男, 江西泰和人, 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副教授。

设县时指出：“汀州、清远二都，东连福建平和县，北接上杭、永定二县，西距程乡，南抵海阳、饶平二县。地方旷荒，谿峒险隘，治教鲜及。是以盗起必蟠结于二都，而延及邻郡。屡经行剿，未几，漏网者复聚而据之。”^{[8] (卷4 P3)}为加强教化、消弥“盗贼”，在当地乡宦饶金的推动下，明政府于嘉靖五年以汀州、清远二都设立了大埔县。但是，设县后并未因官府控制力量的增强而社会稳定，“山贼窃发”，时有发生。

随着宋明以来山区的开发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粤东沿海与内地之间的贸易非常活跃，至嘉靖年间形成以汀州为中心的闽粤赣边区商品贸易集散地^{[9] (P326)}。大埔介于潮州与汀州之间，为水陆交通的必经之地，海陆商品源源不断经此转运各地。这些过路财富，对于土瘠民贫的“梗化”山民而言，据为已有的吸引力自不待言；而对广大偏僻山区，官府控制力量相当薄弱。因此在一些地势险要的必经路段，渐成“山贼”多发之处。如位于汀江边地处大埔与上杭交界处的产坑、看牛坪，嘉靖二十三年“贼首”刘全联合上杭“笙竹寨、三图诸盗，互肆剽掠，四境苦之”^{[10] (卷6 P14-15)}。平民百姓不服官府管辖的为“盗”现象，亦相当普遍。正如当时乡宦饶相在分析原因时所言：“民见奸宄得志，强梗莫怨，多弃本业而恣浮荡，蔑训典而志淫邪，正气亦复不存。”^{[11] (卷上 P16)}

位于大埔东南的白垵村，地处由县城茶阳至饶平官路上的一个小盆地，四面环山，地势险要，是通往饶平、海阳、平和等县的必经之路。大埔建县后，官府在此设立关隘，派乡兵守御^{[12] (卷6 关隘)}。但仍无法阻止此地成为“贼巢”，居民为“贼”为“盗”，屡见不鲜。而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参与张璉的“飞龙国”。

“张璉者，诏安、和平间大盗也。聚众数万，僭称王号。改季，设科取士，伪署十三道都督、阁老、翰林等官。筑城八十余，占据三县地。流劫江省，杀副使汪一中，声言长驱江浙，取南都。”^{[13] (P5)}张璉祖居距白垵约30公里的饶平县上饶堡乌石村，原为县署书吏，因“罪”逃入“贼巢”大埔木窰。在嘉靖三十九年趁粤闽赣一带海倭山寇交相蜂起之机而起事和建立“飞龙国”过程中，得到大埔“贼”杨舜等的支持，杨舜因而被封为王：“大埔贼肖晚、罗袍、杨舜三人因与璉歃血，璉为长。而诸巢数百辈皆附之。于是璉封晚、袍、舜三人为王，其余伪授官不可胜记，而璉自称飞龙人主。”^{[14] (郑明选《南京兵部侍郎北川陆公行述》，卷452)}这个杨舜，是白垵杨氏七世杨洪之子。乾隆《杨氏族谱》称其及兄弟尧、汤、孔“皆荡秩不自检束”，“率以奢侈结匪人”^{[15] (杨拔元《世祖直斋公行述》，备考卷6)}。

嘉靖四十一年朝廷调集粤、赣、闽三省官兵7万余人，分五路围攻，其中一路就是攻打白垵。关于攻打过程，当时广东著名士绅黄佐所撰《岭东平三饶寇碑》说：“右哨由大埔胡料乡，以掣其臂，则分巡南韶金事贺君泾与浔梧参将祝君明监统之。攻克白垵、吴家畚等巢。而饶平连结大埔之湊，遂摧折矣。”^{[14] (卷69)}可见白垵是“飞龙国”的一部

分，并为主要巢穴。平定张璉之役“斩级六千六百余级，招降安插男妇一万五千一百余口”^{[16] (卷11 P3)}。白垵各姓受到沉重打击，杨姓、李姓各被杀一百余人，杨舜及两个弟弟俱死，财产被没收。长兄杨尧则隐姓埋名，被“安插”在饶平县上饶坑背^{[17] (P40)}。而其叔父富豪杨淮因与官府配合密切，在花费了大量财产后得以脱身^{[12] (备考卷6 P14-17)}。

“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县令郭某在大兵镇压张璉起义后，为使当地人服从国家统治，普遍设立社学，积极在乡村推行教化政策：“各社礼教不及，民用蹈于匪彝，侯为申明，置立社学，且量拨没官田土以贍社师。复议立乡约，宣扬圣谕，演为说文诗歌，颁布各社，期于遵行，以训迪民间子弟，良切风教。”^{[11] (卷下 P19)}而大埔山民经过官军的多次打击后也认识到，对抗官府要付出巨大代价。因此在官府教化之下，埔民“咸畏威守分，力穡服勤，无啸聚弄兵之徒也……差输以时完报”^{[11] (卷上 P32)}。

要和官府拉上关系，提高社会地位，取得控制乡村社会的合法性，在“学而优则仕”的社会环境下，惟有读书科举一途。而读书科举的重要性，在白垵有着关系身家性命的传奇。在这次“灾难”中，杨淮之所以能够脱难，除身为富豪外，相传最主要的是他曾有恩于几个读书人和为官者。福建龙溪县举人陈令在去潮州府任职时，途经白垵，妻子难产，得杨淮救助才得以平安。福建福清县书生陈仕贤、张谷游学粤东时，被杨淮以优厚待遇聘为塾师，但并无学生可教，因而得以专心准备科举考试，考前又得杨淮厚赠。后两人先后考中举人、进士，任职于广东臬司和刑部。杨淮因其侄子杨舜事受牵连，在潮州府被捕盗通判陈令所开脱。在被送至省里审判时，又为陈仕贤、张谷所救，因而幸免于难。这些人通过科举而取得对国家资源的支配权和地方事务的处分权，使杨淮深刻认识到读书科举的重要性。因此在回家后，不惜重金建筑了规模宏大的书院——大书斋，并为子孙“延师教诲，劝学不辍”^{[15] (杨拔元《世祖直斋公行述》，备考卷6)}，希望他们能够走读书科举为官之路。

白垵杨氏、肖氏等从弘治年间起，就有人读书，但效果不是很显著。“张璉之变”过后，白垵各姓明显改变了对官府的态度，读书参加科举的人越来越多。至崇祯年间，白垵先后有杨廷纪、丘大复考中举人，并成为对付地方“寇乱”的一支重要力量。

明末万历以来，粤东地方动乱不断，“寇贼猖獗”，先后发生“钟大魁之变”等数十起。其中影响较大者有崇祯元年的平远苏峻等“五总之变”，崇祯三年的“钟凌秀、叶阿婆、陈蜡烛之变”。他们“流窜”于粤闽赣之间，地方社会动荡不安^{[18] (卷7 兵事部)}。与官府联系紧密的地方士绅，纷纷组织乡兵进行抵御。崇祯三年，钟凌秀等率众千余从福建平等地“抢劫”回平远途径白垵时，“白垵乡兵乘其饥疲，斩获无算，擒巨魁吴四舍”。而白垵乡兵之起，“首倡者文学昂起杨绍震暨杨绍霞”，“而君鼎杨遇、须及杨廷纲、君卜杨选，皆文学之有志请缨者，相与协赞从事”。这

些秀才组织和统率的乡勇被县城茶阳乡绅饶澄称为“真我邑之干城”^[19]（饶澄《白垵乡义勇公阡记》，卷36）。可见经过七八十年的教化后，白垵人已完全改变了以前的传统，实现了社会转型，一批受过儒家正统思想熏陶的士绅正在崛起，并成为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

二、“同堂七魁”所见白垵科举之盛

自明末崇祯年间有人考中举人后，白垵科举开始崛起。虽然清初社会局势动荡不已，但白垵人顺应时代潮流，科举业仍得到发展，至雍乾年间发展至鼎盛。

“丁卯棘闱开铁网，杨家七子何济济。人号双珠出老蚌，德基锡恩宁馨儿，必说德徵吾犹子，棣萼交辉光陆离。桂林老守霜入鬓，闻信不觉扬双眉。上官同僚齐举贺，共道此事天下稀。文章遇合偶然耳，根深实遂良有以。”^[20]（卷中，P173）这是杨准的六世孙杨缵绪为两个儿子中举而写的《为廷、砀两男竖旗祭祖祝文》中的一段。乾隆十二年九月，时任广西桂林府知府的杨缵绪接到家信，得知在该科乡试中，杨家有7人同时中举，其中两人是杨缵绪之子，其余5人是其侄子，从而获得“同堂七魁”之誉。兴奋之余，他当即写成该文，着家人送回白垵老家，告祭先祖。

名闻天下的“同堂七魁”现象，在白垵确非偶然，“根深实遂良有以”。自“杨舜事件”后杨准重视读书科举以来，白垵开始形成重视文教的传统，逐渐积累至深厚的家学渊源。白垵第一个贡生杨善，嘉靖年间“家居教子，甚有义方”。其孙绍霖、绍震，曾孙联珠先后于明末清初“俱以岁荐，世其业”^[19]（卷28 P1）。即使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过程中，仍攻书不已。如薰，“申酉之季（1644~1645）四方鼎沸，干戈蜂起，避居围寨，东西迄无宁宇。父（士薰）攻书昼夜不息”^[4]（上编，P68）。秀才丘宗文甚至对子侄说：“今天下丧乱，汝第读书以待天时可也。”^[21]（丘建猷《七世祖洪正公行述》）。杨廷章在鼎革之际，除留下口粮田外，将大部分田地贱价出售，以所得“力购古书，延名师，以敦训儿曹”，“厥后子孙，列庠序者十余辈，选贡登科第，亦不乏人”^[15]（备考卷4）。

正是由于这些有识之士的提倡和身体力行，“迨至亲党之后生小子，闻风而发愤，考德而问业，因之胶庠鹊起，斯文蔚兴”^[4]（上编，P75）。也正是这种在动乱中对社会稳定的冷静而理性的肯定判断，于社会动乱中反其道而行，在乱世中读书，不断积累，一旦局势稳定，国家开科取士，则占得先机，从而取得成功，为科举兴盛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中，白垵人依附粤东地方豪强吴六奇集团，后又随吴六奇归附清政府。在顺治八年清政府任命的第一任大埔县令到任后，白垵人即纷纷参加科举考试。其中垵南人杨士薰、杨士兄弟考中秀才，垵北肖翹材在乡试中更是考中第二名举人，引起世人注目。顺治十五年肖翹材考中进士，再次名震粤东，标志着白垵科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肖翹材等人的鼓舞和引领下，白垵科举至雍乾年间相当兴盛。总观乾隆二十年以前白垵的科举，有如下引人注目之处：

人数多，占全县的比重大。据嘉庆九年《大埔县志·选举志》统计：白垵共产生翰林4人，占全县总数的66.7%；进士11人（其中杨姓8人），占全县61.1%；举人41人，占全县47.8%。明代有“父子进士”之称的茶阳显族饶氏，这一时期仅考中进士1人，举人8人，不及白垵杨姓的1/4更无法与白垵地方相比。而且自明末崇祯年间以来，历朝延续不断。据统计，白垵顺治年间中举人2人，进士1人；康熙年间中举人7人，进士3人；雍正年间中举人11人；乾隆前期中举人21人，进士7人。

相对集中，社会影响大。入清以来，每次生员考试，白垵都有数人入学。甚至有1年全县共取中秀才12人，其中白垵杨姓竟占了10人。进士、举人考试同样相当突出。垵北肖宸捷于康熙五十七年考中进士，被点为翰林。3年后，垵南进士杨之徐之子杨缵绪亦做了翰林，“太史垵乡南北居”^[4]（下编，P145），一乡两翰林，而且还是表兄弟，传为佳话。杨之徐本人亦赢得“父子进士”的称誉。杨之徐的孙子杨允玺于雍正二年考中举人，其家被称为“三世科甲”。杨之徐的另外两个儿子杨翹时、杨演时先后于乾隆元年、十年先后成为进士和翰林，号称“一腹三翰林”、“杨氏三株”^[19]（卷20 P12）。在乾隆十二年“同堂七魁”之前两年，杨成梧、杨演时、杨文振“同捷南宫”，白垵杨氏“同榜三进士”就已经名闻全国了。

随着科举人才的崛起，这批士绅在乡居过程中，以正统儒家理念重新整合清初以来的地方社会，从而对乡村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土堡楼寨”与乡村聚落化

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先有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后有清军入关及各地的“反清复明”，动荡长达50年。而在粤东地区，一直到康熙十九年清兵攻占达濠寨、丘辉逃往台湾，社会局势才稳定下来。在此之前，闽粤地方割据势力梁良、江龙、刘良机、吴六奇等，往来于大埔各地，白垵受到沉重打击，人丁被杀，财产被掠，住房、祠堂被烧。

面对动荡的社会局势，为保护生命财产，各乡村纷纷修筑传统的防卫设施——土堡楼寨，增强自卫能力。正如肖岁材在寻求建造“鸣凤楼”的合法性时所说：“楼以防变，非必变而始楼也。国家筑城凿池，设兵守之，无非为保民保邦计。而乡村之远于城者，则有土堡楼寨。凡以守乡里，保宗族，亦即所以翼国也。”^[22]（肖岁材《鸣凤楼记》）

顺治元年，“明祚鼎革之际，寇贼四起。乡人杨廷拱、杨士蔚等，率众于白垵乡中筑土堡，练丁壮自卫”^[23]（卷2《白垵堡》）。修筑了宁远楼，“外捍而内卫者无稍

暇”^[24](卷下, P52),族人得以安然无恙。肖氏建有鸣凤楼,后又增建保定楼。杨氏增建职思楼、三和楼、源溉楼、花萼楼等,池氏建金汤围,张氏建大土楼等。这些楼都非常坚固、结实,并且规模很大。如鸣凤楼,“周六十间,层而上之者三”。康熙初年肖其宽所建之保定楼,“楼寨三层,成圆形,为房室一百五十余间。周围开走马通巷,外墙遍设炮眼,便于战守,重门铁闸,异常坚固。寇至,族众皆避居其中。甲寅三藩之变,耿精忠遣兵四出,闽寇田养民煽乱大埔县境,舜民(即肖其宽)复捐谷二千余石,备器械,严守御,乡里赖安”^[23](卷5,《保定楼寨》)。

这些倡建者多是有力量和影响的地方士绅。他们凭借在地方上的声望,以及对保卫家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当了修筑围楼的倡导者。鸣凤楼于康熙七年被大洪水冲塌,监生肖其宽“随合族老,谋移建”。宁远楼也塌于这次洪水,贡生杨士薰“亟倡建复。及堡成,而寇至,族众依以捍卫”。“一乡烟口,不下数百家,悉棲保楼中,赖以生全。”^[4](上编, P61)三和楼倡建者贡生杨鲲云,“念旧有职思楼、宁远楼,为防守计,而人众恐不能容,倡筑三和楼,鼎峙犄角,有备无患”^[15](备考卷2, P23)。

土堡楼寨的建立,一方面为族人保护生命财产提供了保障,增强了防卫能力。“族之人聚于斯,血脉流贯,众志成城,其捍灾御患,若手足之捍头目,不令而速。”^[22](肖岁材《鸣凤楼记》)另一方面为族人聚居提供了条件,并由此改变了乡村聚落形态,使各村落宗族由散居变为聚居,增强了宗族的内聚力。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士绅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敬畏礼教”与村落宗族化

面对明末清初人心思乱的社会环境,白垵士绅们非常清楚,要团聚族众,约束村民,消除不稳定因素,使地方免于成为“盗区”,须重建社会规范,确立一个等而有序的社会。而当时可以直接利用的,就是顺治九年颁行的《六谕》和康熙九年颁行的《上谕十六条》中“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等规定^[25](卷2, P13)。为此,他们对官方认可的宗族社会组织形式进行重构,“齐以礼法”^[15](《续修族谱序》),用官府提倡的礼教来规范族人。其主要措施是重建祠堂、制订族规、创设族产、编修族谱等,从而形成村落宗族化过程。

祠堂作为宗族的象征,是宗族成员明世系、讲昭穆、明礼让的神圣空间。清初的白垵士绅非常明白祠堂的重要性,他们借鉴宋儒程颐的做法:“物本乎天,人本于祖。故世代远,裔胤蕃,上溯所自,祇根于一人之身。则营建宗祊,因之岁举时祭,用伸报本之诚,礼也,亦情也。”^[15](备考卷3, P11)既然子孙都是由同一祖宗所传,因此建祠堂祀祖先以聚合人心相当重要。明末杨氏、肖氏所建祠堂,在明清鼎革之际均毁于战火。同时世道不靖,“不清不

明”,人心思乱^[11]。那些认同清政府并获得功名的士绅,便急急以恢复社会秩序为己任,其首选措施就是建祠堂。肖翱材考中进士回乡后,即倡建宗祠,于康熙元年建成心藏堂,杨士薰也于康熙六年建成延庆堂。他们定期组织祭祀活动,“瞻拜其下者,仁人孝子之思,复油然而兴矣”^[4](上编, P133)。

为进一步整合族众,士绅们还以“礼以义起”为由,以开基祖为始祖,定为大宗,以分房祖为小宗,兴建一批宗祠,建立大小宗制度。杨氏本只有四世祖祠,开基祖附祭其中。至康熙初年,贡生杨士薰认为于礼不合,谋建祀奉开基祖的大宗祠。后由其子杨之徐于康熙二十八年建成,祀奉开基祖,从祀二、三世祖。并从嫡长子中推选宗子,每当春秋祭祀,由宗子主祭。以四世祖祠为小宗祠,主祀分房祖四世祖,从祀五、六、七世祖。各房再依经济能力建筑房祠。从此杨氏实行严格的大小宗制^[4](下编, P32)。肖翱材登进士后,先是倡修祀奉开基祖的大宗祠,后又倡建祀奉分房祖四世的小宗祠。丘、池等姓也相继建立了大小宗祠。随着士绅的增多,宗族的扩大,经济实力的增强,所建祠堂逐渐增多。据族谱统计,至乾隆二十年,杨氏有祠堂15座,肖氏11座,池氏4座,丘氏6座,祠堂在白垵乡村社会中逐渐普及化。重建祖祠,使子孙岁时祭祀瞻拜有所,达到收族的目的;而实行大小宗制度,则进一步强化了等而有序的礼制观念,同时为作为宗族领袖的士绅合法地全面控制宗族提供了事实依据。

为使宗族管理制度化,各姓先后制订了以“礼”为核心的族规家法。如乡绅肖俊章会同合族绅耆制订的肖氏《族规》,共立“户首办粮”、“立宗子”等12条。其中“戒斗殴”条规定:“凡族间有事,必先鸣之尊长、次房长处。不听,然后鸣之宗长,以理直之。又不听,然后鸣之约保,自有是非公论。若未投明而遽相斗殴者,房宗长拿到宗庙中重责。不服者,合族攻之,呈官治之。”^[22](《族规》)明确规定了宗族事务必须“循礼”的处理原则。其它各姓都制订了类似的族规。

“祖宗生我我生儿,门户担荷更仗谁;俗弊族繁贫日甚,义田乡校急维持。”^[4](下编, P129)这是杨之徐在得知儿子缙绪考中进士并选为翰林时写的信,从中可知解决族大人繁的生计问题成为当时士绅们所面临的一大难题。随着清初粤东社会逐渐稳定,白垵各姓人口飞速发展,其中以杨姓和肖姓尤为突出。杨氏宗族在清初仅数百丁,至康熙五十五年时“计丁二千有余”^[4](下编, P49)。肖氏男丁也在千人以上。人口的猛增,导致生存资源非常紧张,杨之徐不只一次地感叹:“迎来家口浩繁,贫病交功,日坐愁城。”^[4](下编, P47)原有的公共产业“公尝”,自明末动乱以来,“耗于强食矣”^[4](上编, P75)。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便难以救助。为此,各宗族首领积极倡导以祖宗名义建立和拓展共有财产,设立蒸尝、义田,发展共有经济,增强宗族的社会保障能力。

杨氏在杨之徐、杨天培、杨缙绪等士绅领导下,先后设

五、“白垵夙称邹鲁乡”

立和拓展了始祖、四世祖、六世祖等蒸尝。雍正六年经杨之徐倡议,以宋代范仲淹为榜样,设立宗族义田,“以瞻鰥寡孤独,及贫死而无棺者”^{[4](下编, P254)}。肖氏在肖翱材、肖其宽等倡导下,创立和拓展了始祖、二三世祖、四世乐耕公等公尝。康熙十七年,为避免“地方当役”科及穷户,监生肖其采捐出田产创设“义田”,所收租谷作为肖氏宗族每5年承担一次地方差役的费用。“如其有余,则累利息。俟其盛大,增置田亩,以丰祖祀,建义学。”^{[22](《义田碑记》)}据乾隆隆族谱统计,至乾隆二十六年,杨氏共设有蒸尝66份,田产1905亩,每年所收租谷达73万余斤,此外还有店铺和大片山林。肖氏蒸尝租谷在20万斤以上,丘氏5万斤以上。这些公尝、义田所得,除了祭祖、纳税等外,每年要分给宗族成员丁子谷。如遇灾荒,则于宗祠煮粥赈济。庞大共有经济的创设,为宗族成员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

为使族众清本源,定尊卑,明礼守法,各宗族在康熙年间相继撰修了族谱。杨氏在康熙以前没有族谱,“自始祖迄今,十六世矣。十世以前,族人稀少,虽无谱,犹寥寥可数”。但“此数世之内,蕃衍盈千,出入相过,几如途之人,漠不相识,不有谱以联属之,系派亲疏,势将散乱而不理”^{[15](杨鲲云《修族谱序》)}。引起了绅耆们的忧虑。“勤劳祖事”的贡生杨鲲云花了6个月的时间,于康熙五十五年修成^{[15](杨之徐《族谱序》)}。肖氏“上代虽有谱,未登梨枣,抄写有限,且多差讹,兼残缺不备”。至乾隆七年,由监生肖惕斋、俊章、凤翔编成。肖凤翔认为所编族谱对族众遵循礼义具有重大意义:“岂徒记乘也乎?实欲收族以尽亲亲之义也。既知亲亲,则上以祖宗,下以贤贤,宁有不知尊之敬之哉?人道之大,孰大于是!”^{[22](肖凤翔《谱序》)}

宗子主祭,祠堂普及,族产拓展,管理制度化,使白垵乡村社会经历了一个宗族化过程。建祠堂,编族谱,强化了宗族成员的精神认同;定族规,建立了宗族成员的行为规范;拓祖尝、创义田,为宗族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而这批乡居士绅的目的,则是通过宗族网络的建构,在地方推行国家礼教,从而取得控制社会的权力,成为村落宗族社会形成和运作的精神领袖。如进士杨之徐,自康熙四十年去职回乡担任宗族领袖后,以儒家伦理“名教”为标准处理族中事务。其大致经历,正如其雍正五年所说:“族人质成,排难解纷,不遗余力。列祖尝祀,提纲挈领,俾有成规。三十年来如临如履,战战兢兢,唯恐大德踰闲,以获戾名教。”^{[4](下编, P247)}

正是由于这批士绅担任宗族首领,以儒家礼教理念整顿族务,使白垵人得以保聚乡里,度过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进而重构宗族社会,实现村落宗族化,逐渐建构起一个完全由士绅所控制的乡村社会,形成“敬畏礼教”的社会风俗^{[26](卷40 P37)},成为整个大埔县社会秩序最好的地方。“埔邑为乡,不下数十。求如垵乡之士守卧碑,民安耕凿,未之能或先也。”^{[26](卷40 P66)}各宗族和谐相处,共聚一区,共同促进地方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对于白垵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盛况,康熙三十八年大埔同仁(今湖寮)人吴达源就有“景彼垵山真烈烈,世间英才常不绝”之说^{[4](上编, P201)}。而杨之徐在其康熙四十八年生日那天吟诗曰:“功名富贵不妄求,饱言仁义施广誉;白垵夙称邹鲁乡,昆友十人事不常。训子义方犹在耳,满庭诗礼庇余庆;弟兄切思年方壮,游泮科名累相望。”^{[4](上编, P289)}其以自己家族为例,具体描述了白垵被时人视为“邹鲁乡”的文化之盛。

明代嘉靖年间被视为“贼巢”的白垵,至康熙年间,村中已是书馆林立,诗书气氛浓厚。据调查,在近代教育改制前,杨氏学塾30座以上,肖氏20座以上,丘氏、池氏都在5座以上。很多学塾在清初甚至更早时就已创立。如清初肖文明经商成巨富后,建宅二座,“筑书台,教子孙读”。肖岁材“建宅三处,皆造书室,延师教子”^{[22](《谱序》)}。而杨准于嘉靖末年所建的大书斋,虽曾多次维修,但作为学塾一直延续至民国初年。远近闻名的杨氏义学,则由杨之徐归田后倡议,以四世祖祠为学堂,由族中名儒主教。众多学塾的建立,科举人才的不断涌现,使白垵成为远近闻名的“邹鲁乡”。

白垵文人不仅精于科举制艺,而且善于诗词歌赋,广交文友。肖翱材与程乡(今梅县)李士淳等名士,互相唱和,“大文尤雅重当时”,名重一时。“凡寿序、墓志、诔章、疏引之属,登门求者,踵相接。亦刻板行世,名《松存轩文集》。”还著有《松存轩诗集》、《韩江萃英录》等^{[22](《谱序》)}。杨之徐结交的文人更多,往来赠答,异常频繁。一生著述甚丰,康熙三十五年刻有《企南轩诗文前后集》行世,后又撰有诗集、文集若干卷。据民国《大埔县志·艺文志》及田野调查统计,清前期白垵文人著述达70种以上,成为当地有名的文献之邦。

大量的文化输出,也使白垵社会地位显著提高。自清初以来,白垵人口发展迅速,谋生艰难。很多文人发挥文化优势,从事“舌耕”,就教于大埔、饶平、永定等周边城镇乡村的学馆、书院,“以馆谷为恒产”。如肖翱材曾就馆于程乡李士淳家的松萝斋和丰良吴文源总兵家的青柳馆,杨之徐曾设馆于河源、茶阳、平和。其中不少很有成就,对于推动当地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杨演时被潮州知府周硕勋聘为龙湖书院山长,“其乡之士,习文风翕然丕振,登贤书者多人”。后又历任广西秀峰、福建鳌峰等书院山长,名噪一时^{[19](卷20 P12)}。而对岭南社会影响最大的是杨缵绪。雍正十二年受两广总督鄂弥达、广东巡抚杨永斌聘请,掌教于初设之广州粤秀书院,“广莞人士,闻其风采,咸思执贄登龙经,赏识者皆当时俊髦”^{[27](卷14 P7)}。他“楷模后进,陶铸英才,立书院条约,敦崇实行,雅尚清真”。结果“二年内文风丕振,髦士蒸蒸,列贤书登黄甲居清要者,从此不一而足。其德业闻望,为广东人士所矜

式”。清代广东第一个状元庄有恭,就是他的学生^[20](卷中,P19)。

六、结语

以明代嘉靖年间的“杨舜事件”为契机,白垵人读书应考,逐渐与官府建立起密切联系,地方社会开始向士绅社会转型,从而改变了传统“贼巢”的社会形象。至明末清初,不断有人考中举人和进士,不仅数量多,而且社会影响大,使白垵逐渐发展为地域文化中心,成为远近闻名的“邹鲁乡”。

科举的发达,文化的兴盛,并不是中原衣冠士族的遗留,而是在经历官府平定“贼寇”的洗礼后,经过数代人的积累之后才得以实现,是国家推行教化政策和地方宗族重视的结果。随着士绅阶层的崛起,他们在明末清初社会动乱的背景下,推行国家礼教,规范社会秩序,重构乡村社会,不仅使宗族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而且对地方社会的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实现由“贼巢”到“邹鲁乡”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士绅阶层充分利用各种国家和社会资源,逐渐控制乡村社会,儒家礼教观念和道德规范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思想,从而使乡村的社会控制形态与社会组织,乡民社会生活较之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国家与地方社会密切的互动关系,而处于中介的士绅则起着主导作用。

村落宗族化,是宋明以来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但因地域社会发展轨迹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在福建莆田平原,郑振满理解为“宗法伦理的庶民化”;而在珠江三角洲,科大卫、刘志伟则理解为“庶民用礼教把自己士绅化”^[28]。曾为“贼巢”、地处偏僻山区的白垵村落的宗族化过程,则是伴随着清初士绅阶层的崛起,为解决所面临的迫切社会问题,通过推行国家礼教而逐渐控制宗族权力的过程。

白垵虽为个案,但由“贼巢”到“邹鲁乡”的社会变迁,在粤东北客家地区具有普遍性。明正德以来,粤东地区正经历着一个大开发的时期,同时也是族群冲突、融合最剧烈的时期,农民起义、土豪占山为王等事件层出不穷,社会动荡不居^[29]。对此,乾隆年间大埔人饶堂曾有追叙:“吾埔居岭海之交,依山则伏莽凭陵,近洋则海氛叵测。计自有明一代,为盗贼蹂躏,一寇未平,一寇复起,征剿旁午,求数十年戢宁安堵,了无可得”^[30](《纪志》,P106)。清初以前的程乡、大埔是粤东“寇乱”最严重的地区,社会动荡不安,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但至康熙二十年社会稳定后,逐渐发展成为客家地区科举文化最发达之地^[31](P20)。通过对白垵乡村社会变迁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客家重视文化的缘由,进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客家传统社会。

[参 考 文 献]

- [1] 陈春声. 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J]. 明清论丛(第2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
- [2] 胡希张,等. 客家风华[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 [3] 罗香林. 客家研究导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 [4] 杨之徐. 编年录[M]. 铅印本. 1924.
- [5] 张廷玉. 明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 [6] 郑振满. 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变——兼论明中叶的财政改革[J]. 中国史研究,1998(1).
- [7] 刘志伟.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
- [8] 谈恺. 虔台续志[M]. 嘉靖三十二年刻本.
- [9] 黄挺,陈占山. 潮汕史[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 [10] 宋嗣京. 埔阳志[Z]. 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 [11] 饶相. 三溪文集[M]. 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 [12] 吴立思. 大埔县志[Z]. 嘉靖三十六年刻本.
- [13] 钟秉文. 乌槎幕府记[M]. 成都:巴蜀书社,1993.
- [14] 黄宗羲. 明文海[M].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 [15] 杨缙绪. 杨氏族谱[Z]. 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 [16] 郭子章. 潮中杂记[M]. 万历年间刻本.
- [17] 杨启献. 潮汕杨姓[M].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
- [18] 吴颖. 潮州府志[Z]. 顺治十八年刻本.
- [19] 温廷敬. 民国大埔县志[Z]. 1943年刻本.
- [20] 杨朝珍. 白垵杨氏文萃[M]. 上海铅印本,1929.
- [21] 丘焕枢. 大埔百侯丘氏家谱[Z]. 1942年手抄本.
- [22] 肖惠南. 大埔白垵肖氏族谱[Z]. 1935年手抄本.
- [23] 李介丞. 明季岭东山砦记[M]. 1936年手抄本.
- [24] 肖翺材. 松存轩文集[M]. 康熙年间刻本.
- [25] 简畴. 大埔县志[Z]. 乾隆九年刻本.
- [26] 周硕勋. 潮州府志[Z]. 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 [27] 梁廷. 粤秀书院志[Z]. 嘉庆二十三年刻本.
- [28] 科大卫,刘志伟. 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J]. 历史研究,2000(3).
- [29] 唐立宗. 在政区与盗区之间——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动与地方行政演化[M]. 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02.
- [30] 饶堂. 茶阳饶氏族谱[Z]. 乾隆四十八年修撰,光绪三十二年重刊本.

责任编辑:赵洪艳】

find how complex and abundant the reader is. Enlightened by Wolfgang Iser's view that works is a kind of response-inviting structure, it posits that readers should be another kind of response-inviting structure. It attempts to give literature reception a theoretic description as clear as possibl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herefore, the reader's receptive attitude could be accommodated before they come into works.

Keywords the reader; works; response-inviting structures; literature reception; fusion of horizons

From “Lair of Thieves” to “Country of Culture”: The Social Changes in Baihou Village in Dapu County in the East of Guangdong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XIAO Wen-p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Hakka Research Institute, Jiaying University, Meizhou, 514015)

Abstract The local society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turmoil to stability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in the east of Guangdong.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Baihou Village in Dapu Count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mergence of country gentry's stratum and their influence on and function in local social changes from turmoil to stability.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understand the details and inner mechanisms of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st of Guangdong and the traditional social formation of Hakka.

Keywords lair of thieves; imperial examinations; country of culture; social changes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the Dyke Board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TANG Fu-man, ZHOU Xing-li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Dyke was a kind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which aimed at managing the dykes in the Delta of Pearl River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It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mass motivation, money collection, flood-prevention and irrigation-dispute medi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local government tried its best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the Boards, but its authority had never penetrated into the basic units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Keywords the Delta of Pearl River;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dykes; grass-roots unit

A Study on the Traditional School's Power and Influe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ZUO Song-tao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The detailed study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schools (*Sishu*) and the teachers (*Shushi*) after the abolishmen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is scarce at present. Some scholars insist that from then on *Shushi* has lost the right of speaking in the society; however, the historical facts show that during a long period from the late Qing to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Shushi* who has education power but not the teacher of the modern schools. The common people did not accept the modern school.

Keywords abolishmen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Sishu*; *Shushi*;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